美国动态（半月刊）

2020年12月1日（第227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贝德：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非敌人

“尽管中国给美国带来挑战，但美国不应夸大挑战，也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

中美关系

上海美商会调查显示美企对在华运营前景更加乐观

上海美国商会 11 月 20 日公布了一项新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宣布胜选之后，大多数美国企业对在中国运营的前景更加乐观了。

这项于 11 月 11 日至 15 日进行的调查显示，124 名受访在华美企负责人中，只有两人对在华运营前景感到更加悲观。相比之下，54.8%的美企负责人表示，对在华运营前景“更加乐观”，8.1%表示“乐观程度大幅提高”。

仅 5.6%的受访者预期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增加对华关税。相比之下，70.2%的受访者预期下届美国政府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在贸易问题上共同对中国施压。

近一半(47.6%)受访企业预期它们 2020 年的收入会超过去年，而在 7 月份的调查中，预期收入增加的企业仅占 32.5%。此外，大多数在中国从事制造活动的美企表示，今后 3 年内没有把制造业务迁出中国的打算，只有 3 家受访企业称打算把至少 30%的制造业务迁往其他国家。

调查还发现，只有 13.7%的受访企业打算增加在华投资，其他大多数企业选择静观事态发展，或者尚未就未来发展计划拿定主意。

拜登上任后美中贸易战或将延续

BBC 网站近日载文称，多位专家表示，美中贸易战似乎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拜登上台后，无论是手段、策略还是最终目

标，都可能发生巨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认为，尽管拜登多次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废除特朗普的多条行政命令，但中美贸易战仍会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拜登任职的四年。贸易战不会是一场“始于特朗普，终于特朗普”的战争，它源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厚背景。

赫夫鲍尔认为，中美贸易战已演变成“第二次冷战”的一部分，战况可能会有起伏，比如拜登在言语上可能不像特朗普那么激烈，但中美关系基本不可能回到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不过，拜登也不太可能一上任就加大火力，对中国发起新一轮贸易制裁。

经济学人智库（EIU）研究分析师伊莫金·佩吉-贾勒特（Imogen Page-Jarrett）认为，拜登可能不会挥舞关税大棒来威胁中国，而是利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集体谈判以及国内税收政策来支持美国企业。

在贾勒特看来，拜登将更倾向于从贸易问题转向在更深层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包括人权和地区安全。在当前的环境下，这对拜登政府来说，不仅合乎心意，而且在政治上有利可图。预计拜登将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更多制裁。

贝德：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非敌人

“尽管中国给美国带来挑战，但美国不应夸大挑战，也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杰弗里·贝德（Jefferey Bader）近日撰文称，对美国和世界而言，美中关系将是 21 世纪最重要

的关系。尽管中国在各领域均对美国构成挑战，但不应夸大中国带来的挑战，也不应将中国视为敌人。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带来的挑战之大，不可否认。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与美国在对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的技术平台创新方面展开竞争，发展能够在西太平洋制衡美国、使武统台湾成为可能的军事能力，并在一些美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多边机构和标准制定机构中发挥决定性影响力。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双方的较劲，但大多数问题都是大国竞争所固有的，美国不应因系统性分歧而妖魔化中国。

尽管中国看上去非常强大，但它的弱点将阻碍其成为全球领袖。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想要威胁美国本土，或者复制美苏冷战的模式，与美国进行全球对抗。中国预计将在东亚和中亚争取经济上的卓越地位，在西太平洋对抗美国，并在亚洲以外地区追求更大但并非主导性的影响力，但中国无意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或卫星国家组成的网络，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或扮演美国近几十年来扮演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虽然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近期的总体框架，但将中国视为敌人将违背美国的利益。在一些跨国问题上，美中合作至关重要，而且美国的敌意将会导致下一代中国人的敌意。美国不应在外交、科学和学生交流与合作以及经济保护主义等方面与中国进行恶性竞争。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美国不应该谋求也不可能赢得这种竞争。

拜登的第一要务是应对国内问题而非中国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的文章称，随着过渡程序开始，拜登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实力、重建美国国内竞争力和国际领导地

位，而非中国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已经表示打算解决竞选中的主要问题: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和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他需要恢复内部进程，使其政府能够继续专注于这些目标。

那么，这对美国对华政策意味着什么？首先，小布什的“永远的战争”、奥巴马失败的“转向”和亚太贸易政策，以及特朗普减少联盟和集体行动的举措，都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当美国还在迷茫时，中国抓住了难得一遇的机会，来填补领导力的真空。因此，重建美国国内竞争力和国际领导力是第一要务，中国问题必须排在后面。

扭转疫情、强化财政工具、刺激中产阶级生产力和收入恢复、鼓励研发，都为美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应对中国挑战提供了手段。华盛顿需要重新学习团结各国的艺术。拜登应责成其高级经济和卫生官员与国际同行合作，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增长，共同抗击疫情。如果中国表现出真诚合作的意愿，应及时邀请。

高级职位的候选人可以在参议院批准过程中陈述新总统的政策偏好。任命一位称职的驻华大使，有助于恢复民间对话和纠纷管理。这些候选人可以重申那些为中美关系提供“防护栏”的基本原则，比如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同时提醒中国，在一个潜在冲突更大的时代美国的红线是什么。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鹰派正发出信号，希望离开时留下尽可能多的“残骸”。这些人实际上是“只抓小鸡的鹰”，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们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越过中国的红线，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要为可能牺牲的生命和财富负责。

特朗普的鹰派希望将拜登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不得不改变这些最后一刻的决定，并被批评对中国过于软弱。在可能的范围内，拜登应该把清理这个烂摊子的责任下放给级别更低的官员。

如今的亚洲今非昔比，中国更强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不受挑战的霸权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如果美国再次强大起来，那么美国和该地区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和雄心的国家，将在坚守它们在二战后取得的成就方面做得更好。

美国外交

学者：拜登应保留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对美国有利的方面

《华盛顿邮报》近日登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的文章称，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既要抛弃特朗普的破坏性单边主义和对民主盟友的侮辱性态度，也要保留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承诺、保护美国对外贸易、在贸易上对华强硬等对美国有利的外交政策。

文章称，拜登需要恢复美国的政治中心，尽管左右翼在许多国内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外交政策为拜登重建中间路线提供了机会。首先，重新与民主盟友开展合作。多数美国人认为应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合作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包括抵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扩张主义”。

其次，从中东战略收缩。特朗普正确认识到选民对战略过度扩张的厌倦，但他是在没有后续战略或与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撤军的。拜登应该既娴熟地开展地区外交，又保留能开展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军事存在，并充分利用从中东收缩带来的有利政治条件。

最后，淡化特朗普的经济保护主义，但继续确保美国从全球贸易中受益。拜登不应挑起与所有人的贸易战，而是取消特朗普对盟友的关税，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国；在未来的贸易安排中不断建设美国中产阶级，创造就业，提高劳工工资和环境标准；在

制造技术和工人再培训方面进行大规模国内投资。

美学者梳理拜登将面临的三大挑战

美国卡托研究所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拜登和他的许多支持者可能会将其总统任期视为恢复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传统外交政策的机会。但美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拜登上台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是政治上的挑战。大选表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蓝色浪潮”。特朗普在各人口群体中的号召力仍在增加，包括拉丁裔和非裔美国男性。共和党可能继续掌控参议院，并增加在众议院的席位。美国人民仍存在严重分歧，面对阻挠的共和党，争吵的民主党和失望的进步派活动者，拜登在执政初期可能受挫。

其次是国内的挑战。严酷的现实将迫使拜登将重点放在国内。首要优先事项必须是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投产疫苗，加强医疗保健体系，并刺激经济复苏。第二个优先事项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联邦政府的财政实力。

第三个挑战是确定国际优先事项。继续追求“美国至上”的代价将极其高昂。下任总统需要更加系统地设定希望维护的优先事项，以及他准备为此投入多少资金。这意味拜登将不得不放弃一些他曾经支持的军事承诺，并减少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部署。

民主党中间派正在酝酿关于美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近期载文称，在拜登的团队中，民主党中间派人士正在酝酿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具体可以划分为“修复

派”（restorationist）、“改革派”（reformist）和“进步派”（Progressives）三个派别。

文章指出，拜登不能在外交政策中简单地依靠专家治理。他必须考虑一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团队做出的战略选择，并且他必须做出与美国和世界各地当下的政治相协调的重大选择。

“修复派”主张实行与奥巴马时期大体一致的外交政策，主张以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对冷战后秩序进行精心管理。他们不希望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且对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及其他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寄予厚望。他们支持拜登提出的旨在恢复民主和鼓励合作的“民主峰会”的构想，但对民主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持谨慎态度。他们赞成重返伊朗核协议，并打算继续发挥美国在中东的传统作用。他们通常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并拥抱全球化。

“改革派”认为，要应对特朗普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的潜在力量，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改变。相比于“修复派”，他们更愿意承担一定范围内的风险，并且更愿意接受与竞争对手和部分盟友的摩擦。他们将美国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希望利用对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影响力，达成一项取代伊朗核协议的新协议，并在总体上减少在中东的介入。他们主张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革，重点包括国际税收、网络安全和数据共享、产业政策和技术。

“进步派”认为，外交政策应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削减国防开支，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军事化。但他们也希望对全球范围内专制主义的兴起予以反击。拜登的几位顾问，特别是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还与进步派人士进行了接触。而今，关注美国国内政

策的进步派人士可能成为拜登经济议程制定的推手，而关注外交政策的进步派更可能扮演反对者的角色，在对华政策、伊朗政策以及国防开支等议题上施压。

文章称，拜登应将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视为资产，并积极创建一个能够推动更广泛外交政策辩论并避免思维趋同的团队。“恢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的基本假设和政策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受到压力测试和评估。

美国需调整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策略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1 月 18 日登载约翰·昆西·亚当斯协会政策研究员杰夫·拉米尔（Geoff LaMear）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策略削弱而不是提升了美国的影响力。该策略存在四方面问题。

首先，该策略提出的“十二条要求”针对伊朗的关键安全利益。由于伊朗一贯在军事上较弱，所以其军事战略以代理人和弹道导弹为主。在战略性决策上有着绝对话语权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一直怀疑美国对伊朗政权图谋不轨，因此绝不会让伊朗屈从于“十二条要求”。

其次，伊朗通过利用国内制造业部门，以及促使经济多样化，已经适应了制裁。伊朗通过在国内制造武器来规避武器禁运，并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来维持国防开支。“极限施压”并未瞄准其支持者所宣称的破坏性活动，却给伊朗人民造成了直接的经济伤害，并阻碍了人道主义努力。

再次，拜登计划重新与伊朗开展外交，但制裁行动目前使用的法律机制具有长期性。所以在 11 月之后做出的任何调整，除了会带来对伊朗的公信力成本外，还会面临很多官僚阻碍。

该策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极限施压没有搭配相应的退出策略。美国没有利用经济和外交力量促进谈判，而是越发倾向于使用胁迫。制裁并没有达成“十二条要求”中的任意一条诉求，反而限制了美国通过谈判达到目标的能力，并加剧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美国应调整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策略，并与伊朗重启外交。这不是一件易事，但停止过去二十年来的胁迫行动是重要的第一步。

美中均未明确“赢得”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竞争

兰德公司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美国和中国都没有明确“赢得”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竞争。

为了解中美两国谁在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取胜”，兰德公司研究人员于 2018 年底和 2019 年初采访并咨询了印太地区 9 个国家的 100 余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并形成了研究报告。

报告称，影响力是指一个行为体塑造另一行为体行动的能力，当涉及美中竞争时，关键是相对影响力，即第三国与美国或中国有什么共同利益，两国可以利用什么资源或能力来激励或胁迫合作伙伴。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是动态的、持续的，这与军事冲突不同。

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和中国对东南亚伙伴的重视程度，并将这些国家按照高、中、低的优先级进行了排序，认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美中竞争将最为激烈。研究人员还开发了一个包含 14 个变量的基本框架用以衡量和评估该地区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力，变量包括：外交和政治影响力（双边关系、对美国或中国愿景的支持、对美国地区承诺的看法、地区公众对两国的看法）；经济影

响力（对美中任一方的经济依赖、对经济机遇的评估、对经济威胁的认知、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的意愿）；军事和安全影响力（军事威胁认知、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的意愿、对美国防务努力的支持、军事合作、军事能力、在地区国家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中美国援助该国的意愿）。

研究人员将该框架应用于竞争最激烈的六个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三个关键盟友和伙伴——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和方式不同：美国比中国拥有更大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超过美国；东南亚国家将经济发展置于安全关切之上，相较于中国的军事威胁，通常它们更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实现各种目标，包括削弱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南亚国家相信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制衡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地区国家与美国有更多共同利益，但中国有更多工具来应对东南亚国家，包括更多“胡萝卜”和“大棒”；地区国家不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如果被迫做出选择，可能也不会站在美国一边，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似乎是脆弱和不完整的。

总体上，美国和中国都没有明确“赢得”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竞争，它们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力。美国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影响力要高于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

美国政治/其他

美学者称大选凸显美国的分裂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登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文章称，2020 年美国大选投票率创下战后新高，但高投票率并不是健康民主的标志，而体现了民众的焦虑。文章摘要如下：

2020 年美国大选的模式与 2016 年大选非常相似，几个关键县的微弱优势决定了摇摆州的结果。虽然拜登最终赢得了好几个摇摆州，但他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胜的。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一些温和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转向拜登，从而使其获胜。

从县的层面来看，与 2016 年大选一样，今年大选也显示出深刻和持续的党派分歧。民主党今年赢得了他们在 2016 年已经获胜或以微弱劣势输掉的县；而在共和党 2016 年获胜的县中，数据表明共和党在今年的大选中以更大的优势获胜。

在战场州，拜登和特朗普都从更高的整体投票率中获益，但拜登获益更大。对比大选前一些民调分析，拜登在这些州以微弱优势获胜在意料之中。相比之下，民调并未完全预期到特朗普在一些西语裔社区中获得的强劲支持。今年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创纪录的高投票率并不代表双方候选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可能因为他们非常不希望对方获胜。这种“消极的党派之争”是对称的。民主党和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与独立派人士不希望特朗普获胜，而大部分共和党选民似乎不愿意将接力棒交给沿海地区的精英、全球主义者、自由派媒体和华盛顿的“局内人”。

面对不断恶化的公共卫生状况和重大经济挑战，对两党来说

明智做法是抓住现有机遇展开合作。双方民选官员有责任带领美国走向成功，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选民们应该向他们问责。

美国应推动变革来打破极化僵局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丹·贝尔（Dan Baer）的文章称，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后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将饱受新冠疫情打击、政治分歧严重的美国团结起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制定能得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政策。文章对此提出了四项建议：

第一，投资基础设施。美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依然很大，拜登政府可以承诺推出一项覆盖 50 个州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该计划可以为各州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和机遇。除了支持经济复苏，一项智慧的基础设施计划还应包括推动向绿色能源过渡、扩大公共交通和宽带覆盖率等相关目标的投资。

第二，出台家庭税收抵免政策。美国约有六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税收抵免的法案（如《美国家庭法案》）能够得到广泛支持。进步派支持此类法案，因为其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儿童贫困。此类法案还将给国内有孩子的中产家庭提供巨大的税收抵免，而支持中产家庭对共和党人具有吸引力，因为共和党选民也会从中受益。

第三，提升美国人的技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制度存在三个问题：补贴金额太少、忽略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对非全日制学生不够灵活。两党立法者可以展开协商，增加补贴金额，降低接受补贴的门槛以便将中产家庭纳入进来，并更加适应非全日制学生。数百万美国人将能够立即从中获益。拜登政府还应该继续推动现代学徒培训项目，这不仅会支持经济复苏，也会提高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第四，引领美国走出疫情。美国应出台更多刺激法案，给失业人员和小企业提供更多支持。拜登还应强调医疗保健，制定覆盖全国的免费检测计划，以及未来的疫苗接种方案。

美国防部需制定国家技术战略且投资三类技术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技术一直是取得军事优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在信息革命中拥有先发优势，但让美国在 1991 年占据军事主导地位的技术如今已经扩散开来，因此，美国防部需制定国家技术战略。

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导弹等新技术，以重新获得美军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将需要实行一种适合当今技术格局的技术战略。

这项国家技术战略的关键优先事项包括：增加联邦研发支出；通过理工科教育和高技术移民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有利于研发的公共产品，如数据、计算资源和标准制定；确保政策和监管生态系统能够激励创新；与合作伙伴和盟国合作，确保全球技术生态系统保持竞争性、开放性和安全性。

信息革命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技术发展趋势，促使数字能力（网络、数据和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如果美军要在未来的战斗中保持竞争力，必须成功地利用这一趋势，并在快速应用信息技术获得作战优势方面胜过对手。因此，国防部在技术投资方面应该采取三级方法，投资三类技术：

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国防部技术战略的首要重点应该是，迅速采用通常在商业领域成熟的数字和信息技术，利用它们满足特定的军事需求。未来几年最有可能出现戏剧性变化的能力是那

些充分利用数字趋势的能力：网络、电子战、传感器、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

关键的军事专用技术。国防部还应该投资于关键的军事专用技术，如定向能武器或高超音速导弹（如果这样做有明确的军事行动价值），但应该认识到这些领域的进步是渐进的。材料、光学、能源和电力等非数字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其发展速度比不上信息技术，而且在未来几年，这些技术不太可能给战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格局的“黑马”技术。国防部应该投资可以改变格局的“黑马”技术。根据目前的趋势，这些技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比如量子技术（量子计算、通信和传感）、脑机接口、强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将帮助国防部防范战略意外，并提供早期预警，但国防部不应押注这些技术将在短期内达到可用于作战的成熟度。

总之，美国需要像太空竞赛时期那样倾全国之力，以扭转当前的轨道，重振科学和技术基础。美国在这一竞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包括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移民体系。协调一致的联邦政府行动有助于点燃美国的创新火焰，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持续下去。

兰德公司：下届政府应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兰德公司网站近日载文称，如果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希望推动其政策议程，他必须首先恢复美国人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一直在下降。现在，有很多美国人质疑疫苗的科学性，怀疑政府报告的经济和犯

罪统计数据，并且越来越相信阴谋论。美国的公民基础设施濒临崩溃。美国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重建公民基础设施：

一是增加透明度。当选领导人及其团队应清楚地披露政府的考虑、计划和行动，并诚实地说明获得的成功或失败。首先应全面收集和分享数据，然后由高级官员直接向公众报告。如有可能，应该将这些标准和报告要求加以正式化，以确保它们在未来仍然有效。透明度也应延伸到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中，政府应将新闻媒体视为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伙伴，这可以帮助恢复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信任。

二是任用专家。能力是公众信任的核心，因此，新政府在确定政府职位的人选时，资质必须是决定性因素。确保任命的官员和机构负责人是其所在领域的佼佼者，并确保他们能组建同样合格的团队，将表明政府致力于利用事实和分析作为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的基础。其次，奖励专业知识，让有资质的人用基于事实的分析向公众解释问题，这也有助于在科学等领域重建信任。

三是建立多元化的政府。研究表明，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参与感和被代表之感。因此，确保下一届政府“看起来像美国”，对重建公民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目前，拜登已组建了多元化的过渡团队，在未来内阁的构建和任命中实现多元化更为重要。对于多元化的承诺也应该扩展至各级政府中。此外，应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多样性，如种族、性别、经济地位、宗教、性取向、教育和履历。

四是投资公民教育和发展。公民教育和发展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和成人更好地了解民主的基础、政府的运作方式及其能提供的服务。它还可以弥合鸿沟，在所有人之间营造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新政府可以通过资助旨在鼓励公民责任的学生活动或课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来为各个年

级应具有的公民知识和理解制定标准。此外，要求年轻人服兵役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做法，这可以让他们拥有共同的经历，打破公民之间的社会障碍。为国家服务还可以培养一种参与感，从而增强公民对民主自治制度的信任。

信任的恢复不会很快实现，也不会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但是，新政府可以通过恢复国家公民基础设施，来修复社会的深刻裂痕。美国参与式民主的健康与否将取决于此。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 辑 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200020
电　　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